

本土化中的全球化 ——展望廿一世紀的台灣文學

◎ 陳建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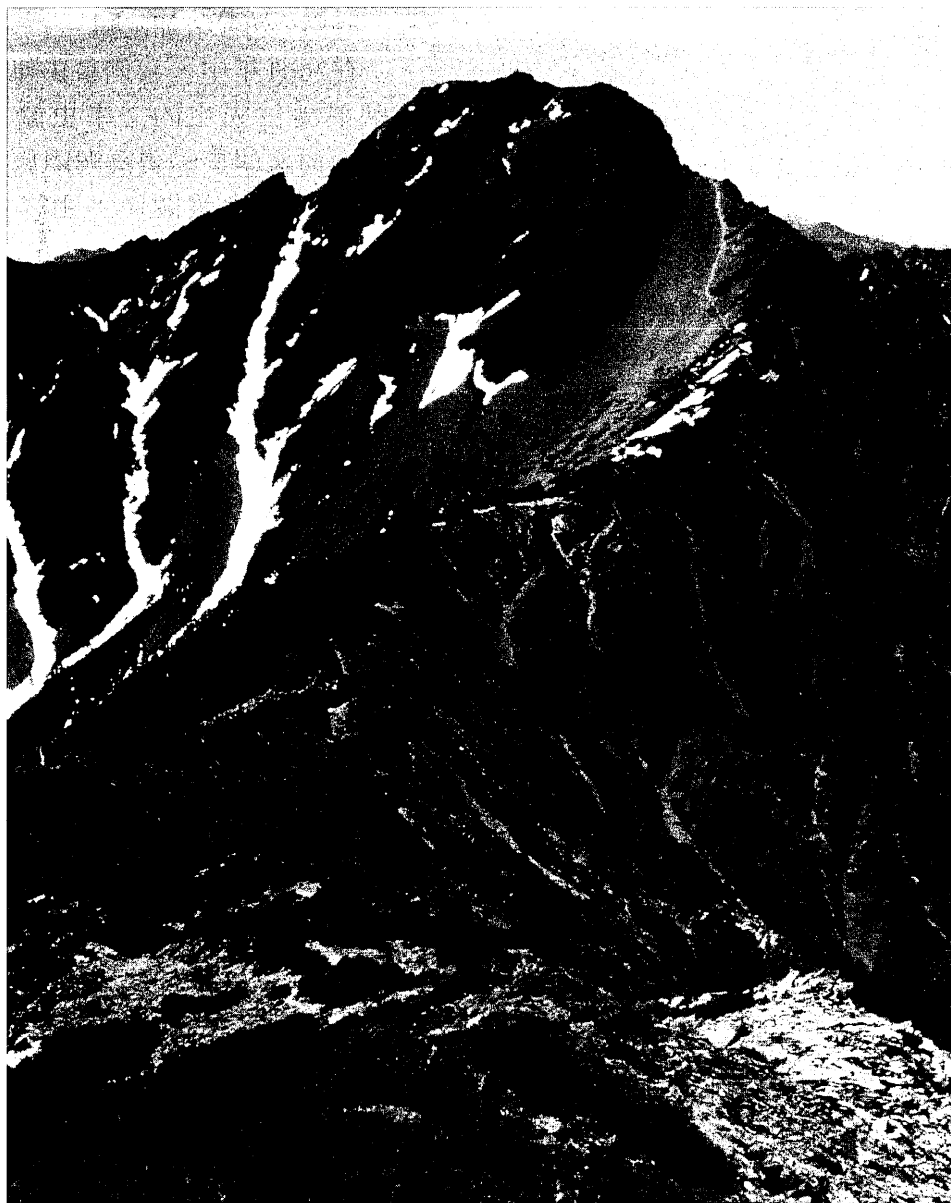


圖1 我們只有一個地球，地球上玉山只有一座，就在台灣。本土化若被模糊或架空，全球化就難以落實。（陳玉峰攝）

前言

在新世紀開端的2001年，要展望未來廿一世紀的台灣文學發展，並非徒然夸夸其言而已。

畢竟想要能夠眺望遠方，要先看看我們腳下踩在何種的高度；要知道未來的方向，先要確定自己是如何走來。於是，新世紀的展望，前提不是預言或臆想，而是對上一世紀的回顧與確認，由此來理解自己的收穫與潛力，也理解不足與缺失，這樣的展望方不失其積極而有效的意義。

整體看來，在二十世紀剛剛過去，接續其腳步的2001年的台灣文學發展，並未有太多的變化。不過，如果把本年放在百年來台灣文學演化的脈絡來看，台灣文學由古典文學經新文學運動到達「世紀末」這個階段，許多文學議題與文學思潮、文學類型，都得到相當程度的開展。也就是說，無論是殖民地時期、後殖民時期的文學議題也好，現實主義、社會主義、現代主義到後現代主義等文學思潮的更迭也罷，抑或是小說、散文、新詩與戲劇等文類的個別或越界的發展，在世紀末前有的已然蔚為傳統，有的則依舊糾葛難明，有的則方生未

死。我們不妨先略加回顧。

在2001年中，我們會由陳芳明與陳映真兩位先生的文學史論爭中看到，台灣文學史的書寫與國族認同、美學標準的複雜關係；由《楊遠全集》、《劉吶鷗全集》、《張愛玲典藏全集》、《洪醒夫全集》、《李魁賢詩集》、《詹冰詩全集》等全集的整編，看到台灣社會積極重整文學遺產的努力；從《日據以來台灣女性作家小說選讀》、《台灣e文藝》的創刊與原住民文學、馬華文學的發展，發現女性、台語、原住民、馬華文學等「次文類」崛起挑戰各種主流文學典律；從《陳映真小說集》（六冊）、《紀弦回憶錄》、洛夫的長詩《漂木》，窺見前輩作家如何不懈地參與當代文壇，而就在此時，包括網路作家等新世代作家亦正喧嘩登場；自《時代小說（1976-2000）：聯合報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集》、《聯合文學》發行200期、《明道文藝》發行300期等現象，看到文學獎與文學雜誌見證著台灣文學世代的興衰；自台灣文學系所成立、數種《台灣文學讀本》、與《台灣文學評論》的創刊出現，察覺到台灣文學在學院化與體制化後必須解決的許多問題。而當然，經由熱烈的「哈利波特現象」、「高行健旋風」，或者「台灣文

學英譯、日譯」等現象，我們也不難看到台灣文學與世界文學交流時的某些特徵。

凡此，可視為本年特殊的事件，卻也不妨將其放在台灣文學發展的時空長流裡來觀察。也許，我們可以從與台灣文學歷史命題具有深遠關連的議題或現象切入，進一步解析其中的問題，同時藉此展望此刻正在開展中的台灣文學百年。

從文學植物園主義，到回歸文學傳統

經由整個二十世紀台灣文學發展的成果來看，從二〇年代「新舊文學論爭」開始出現白話文學，經過三〇年代「鄉土文學論爭」討論文學為誰而寫（寫鄉土裡的勞苦大眾）？用什麼寫（台灣話文才是「我手寫我口」）？那樣一個啟蒙文學、左翼文學、反殖民文學的時代，到今天出現的網路文學、情色文學、原住民文學、女性主義文學、台語文學、兒童文學、通俗文學（言情、科幻、武俠等等）、乃至於馬華文學、香港文學在台灣的發展現象，如果再加上一變再變的各種文學技巧（由所謂「僵死的」寫實主義到魔幻寫實、後設...再來

呢？），那麼說台灣文學界已經長成一座物種繁盛的文學植物園，恐怕是並不為過的說法吧！

然而在世紀末世界經濟發展蕭條，人的慾望似乎不再如此旺盛的時刻，「懷舊」彷彿成了集體的文化轉向風潮。於是我們看到了《五年級同學會》這本集體創作，以及後續引發的「你是幾年級？」的討論熱潮，這雖然不脫商業炒作的痕跡（可以販賣許多懷舊商品），但基本上，我們將之視為台灣人回歸成長年代、單純年代的一種渴望，是台灣人在混亂的世局下尋求價值認同的一種集體無意識的表現。

在文學上我們雖尚未看到這種「懷舊風」的興起，但我們卻想到，台灣文學的童年時代、文學傳統等問題，想到文學對於人們來說存在著怎樣的集體無意識地渴望？當文學家開始專注地描寫他們內心的風景，而以繁複的手法來遮蔽了讀者探問人性內心的可能；又或者是文學不再能提供理想與希望，而終至與昏暗的世局一樣灰暗時。我們不禁要懷念那種文學成為社會良心，文學同時也是令人愉悅的時代，譬如鄉土文學風行的時代，譬如瓊瑤與席慕容風行的年代，譬如日據時期的新文學運動。當然，

時光無法回到過去，但在新世紀，回歸文學傳統是否也可以是「返璞歸真」的一種願望呢？尤其在各種價值體系不斷崩解的年代裡，向文學傳統的回歸與接引或許反而是找到邁向未來路途的一種指南。

文學主體與文學史的疆界

而說到要回歸文學傳統，文學傳統又何在呢？如果要尋找台灣文學在二十世紀發展的軌跡，恐怕就需要由台灣文學史來理解了。

從口傳文學到書面文學，從古典文學到現代文學，從被殖民時代到後殖民時期，台灣文學的發展已然有其不容小覷的成就。但一本完整包含上述範圍的「正格的」《台灣文學史》卻遲遲難以出現。其中，應該包括哪些作家與作品這樣的台灣文學疆界問題，決定了台灣文學史將如何書寫的基礎。而台灣文學的疆界，又要靠文學主體的確立才能決定。問題在於，台灣文學史與台灣社會的認同問題一樣，存在著太多複雜甚至矛盾的狀況，台灣文學史究竟要寫成什麼樣子，就是台灣人如何認識他自己的再現。

從陳芳明與陳映真的文學史論爭

來看，這場以《聯合文學》為論壇的「雙陳論爭」，爆發時間應溯至1999年，起因是陳映真對陳芳明正在寫作的文學史提出批判，兩造之間一來一往數次，戰火直至今年年底才稍歇。雙方的觀點明顯地可以看到文學史觀的競逐，其背後正是兩造關於國族想像圖像之差異，所謂統與獨的史觀，已然正式地公開論辯。一個強調差異，一個強調一統，顯影了各自不同的國族想像。但自一個二十世紀台灣文學的角度來看，日據時期台灣就已經出現數次關於台灣作家與日本作家的論爭，著名的像島田謹二的「外地文學論」與黃得時的「台灣文學史」系列書寫，戰爭期又有所謂「糞現實主義論爭」在爭議台灣作家的現實主義是否對於「皇民文學」與戰爭有所裨益。

文學史觀決定了文學史的面貌，這是每個史家的創見與挑戰，對台灣文學而言，更具有抵抗邊緣化的重要意義。因而我們固然不能宣稱全然客觀，但也不可能討好所有美學意識型態的擁護者，更不可能無限制地收編他者。那些「分類」文學史可以另外成其系統，而與台灣文學史併觀，一樣可以通觀台灣文學的發展。把文學觀察圈限在「台灣」來書寫歷史當然

是很可惜的，把文學史侷限在「國家」來書寫自然也不免未能「一網打盡」。我們當然應該意識到「史觀」的限制與排他性，可以「適度」提及國外影響、外國人士創作（包括日本殖民者），但文學主體則必須確定為台灣作家。若非如此，台灣文學史的存在為何有比大中國文學史、東方文學史或世界文學史這些「包容性」更大的文學史更具有正當性，原因恐怕就在於文學主體的確認與形塑本是文學史書寫的關鍵所在。

我們應該以包容但有主體性的精神來書寫台灣文學史，並且是國家文學史，這樣的問題或許爭議頗多，但卻是展望台灣文學時無法忽略不論的重要課題。

文學典律與文學教育

台灣文學史的建構或許還牽涉到專業問題，但文學教育卻是每個台灣人從小就會面臨的問題，究竟台灣文學如何走進教材裡？如何與傳統中國文學為主的文學教育進行一番「世代交替」？文學教育「本土化」的趨勢漸明後，這顯然也是台灣文學在新世紀的新課題。

誠如我們所知，台灣文學的發展

向來與教育機制中的文學教育嚴重脫節，台灣子弟無法透過教材瞭解台灣本土文學的樣貌，就如同無法瞭解生活在這片土地上先人的靈魂一樣。不過，隨著國家文化機構與民間有意識地整編、出土作家全集，台灣文學的內涵逐漸在具體的作品堆疊起巨大的體積後，許多人不得不正視這個島嶼的文學傳統的確有其獨特而豐碩的成果。

不過，無論在中學或大學的國文課程中，於何謂「國文」尚在認同角力的這個時代下，要選擇誰的什麼作品來做為教材，做為讓台灣子弟培養文化觀、人生觀的國文教材，還頗堪思量。這個與文學史一樣涉及到「文學典律」的問題，實際上是更棘手的，因為文學史尚可以視為史家個人觀點的典律建構，但文學教材卻是更需要擇選具集體認同意涵的所謂「經典」。問題在於，有誰能統合台灣多數人的美學與國族認同而表現於選本、教材之上呢？文學教育只是陶冶學子關於真美善的感受，或者還具有積極認識、甚至認同其文學傳統的作用？

因此，當我們看到2001年中出現的新版民間六種《高中國文》（翰林、龍騰、南一、三民、東華、正中、康熙），以及《台中縣文學讀本》、《日

據以來台灣女性作家小說選讀》時，我們可以想見，這些民間、學界或官方的文學選本、教材，將對台灣的性別、國族、地方傳統的認同造成綿延不絕的影響力。於是乎，我們更可以預見，日後必然有更多的文學讀本、選本、教材，而所謂「文學典律」的塑造，無非就是一種「詮釋權」的確立，這不僅是文學的同時也是政治的。國族政治也好，性別政治也好，都是文學可以發揮的教育效果所造成的，而這個文學詮釋權的爭奪戰，正是台灣社會各種矛盾、對立關係的寫照。

那麼如果來看台灣新近成立的台灣文學系所，隨著九〇年代後台灣文學的研究參與者漸多，台灣文學系所也陸續成立，整體的台灣文學研究急速體制化、學術化，台灣文學評論需要的空間更大，於是出現了《台灣文學學報》與《台灣文學評論》等刊物，日後必然會透過這些刊物呈現出具體的文學研究成果。我們想說的是，文學教育的進行固然有賴於教育機制執行者的健全觀念，但「文學經典」的形成應該是需要學者專家來引領思考的。台灣文學系所教育出來的「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系所教育出來的「中國文學」，究竟誰應該成爲

教材中的經典，正需要更多的研究與論辯。

從文學典律的擇選，到文學教育的正常化，再到台灣文學系所與中國文學系所對於台灣文學的研究與論辯，我們不難發現，台灣文學的發展並非一直是以台灣的文學爲主體的，其間一直糾纏著許多殊異的聲音在對話或爭論，這必定會是下一世紀必須解決的文學問題，同時也是攸關台灣文學發展契機的重要問題。

尊重本土是世界化的基本道德： 台灣文學與世界文學

承上所述，我們如果回歸了文學傳統，建構了國家文學史，確認了文學教育的取向，那麼，台灣文學還有如何與世界接軌的問題，如何讓世界看見的問題。如果世界文學是個大市場的話，台灣文學無論如何無法不被論斤稱兩，這毋寧也是在「全球化」時代根本難以迴避的問題。

然而令人訝異的是，在《2000台灣文學年鑑》中，出現南方朔先生一篇文章：〈「全球化」時代走向「世界文學」〉，其中大意說到：中國移民與世界華人越來越多有以居住地語言寫作的的能力，如高行健以法文寫作獲得

諾貝爾獎，哈金則因英文作品出色也頻獲大獎，至於不少的華裔作家亦積極以外語寫作，在世界文學的版圖上佔有重要地位。南方朔先生將此視為全球化時代的重要文學現象，認為惟有掌握外語寫作，參與世界文學的創作潮流，才有可能「被看見」。然而，他強烈質疑為何沒有台灣移民以外語寫作，並認為這是台灣政府不重視、鼓勵此一潮流，台灣作家耽溺於「某種風格」致使創造力涸竭，並且也受到特定政治因素干預所致。我們最大的困惑莫過於，追求世界文學如果說沒有成為台灣的主要關注點，那問題出在哪裡？就是南方朔先生所謂台灣文學主體性論述造成的嗎？或者真是那些政治勢力「文化鎖國」心態造成的？

我們以為，「本土化」與「全球化」原可並行不悖，但絕不是如南方朔先生所論的那樣，把自己訓練成世界語作家就會被看見並尊敬。要有世界觀，這是我們有眼光的學者專家再三耳提面命的，我們以為，這不僅是常識，更是一種必然。然而，若假藉這種虛構的全球化鬼影子，視為取代本土化的靈丹妙藥，而實際是要批判某些政治勢力（連帶其文化勢力），正可見另有目的。提倡「世界主義」的

英國湯林森教授甚且還提出「道德的全球本土主義」(ethical glocalism)一詞（見《全球化與文化》），就是提醒世界主義者不要太過於輕蔑地域性的文化，因為尊重本土是世界化的基本道德。

難道：「本土化」不是一種普世國家的正常現象嗎？「全球化」不是另一種文化侵略、經濟侵略的盾牌嗎？提出這樣的說法，或許可想見是因應台灣加入WTO後，台灣必須面向世界各國的需要。但如果像南方朔所說，台灣的本土化運動是因執政不當所致，那麼「本土化」反成「全球化」的阻力了。問題是，世界文學需要向西方看齊的仿製品，還是要有台灣土味的土產呢？本土化也許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批判本土化的盲點，並非等於讓全球化來取代本土化的重要意義，不是嗎？

台灣的「全球化」是有目共睹的，看台灣追逐諾貝爾獎得主高行健的文學熱潮，追逐奇幻文學「哈利波特」的全民運動，看某些縣市引進中國作家來擔任駐市作家，如果說「跟風」畢竟也能引領一時閱讀風氣的話，倒也可以欣然以對。但要台灣作家去改寫外文以求世界能見度，這大概是反本土化論者所能想出的最荒謬

的招數了！

我們認為，台灣文學要被世界看見，需要的是更有建設性的意見，例如積極的外譯工作，例如讓「台灣筆會」被國際承認，因為至今國際筆會可以接納中國流亡海外的作家學者所組成的筆會，卻拒絕台灣筆會申請加入，中國的介入杯葛是主因，但就像加入世界衛生組織，乃至聯合國，即使年年受阻，亦不能卻步。當然，台灣文學並不依賴被世界的國家任何肯定而存在，最重要的還是台灣作家如何為他／她的人民寫作，將在這片土地上生活的悲喜呈現出來，也將台灣人的世界眼光呈現出來，具有台灣本土性的文學應該是自然而然的就具有世界文學的入場券，因為這是誰也代替不了的文學特性。

結語：用實踐創造下一輪台灣文學盛世

魯迅說過：「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當有許多人對台灣文學的發展絕望，我們覺得這是虛妄的，因為台灣社會還有那麼多問題等待去書寫、關懷，之所以絕望，是因為我們都在等待別人來為我們打造理想的國度，而除了嘴上抱怨，我們很可能

沒有任何實踐乃至改造的動作。當然，台灣文學充滿希望嗎？這種期待可能也是虛妄。因為當我們連共同關心的目標都找不到時，僅僅依賴官方那種強制式的文學教育，或者依賴進口奇幻文學、諾貝爾作家、中國作家、學習英文寫作來撐場面，就像借別人的衣服妝點門面，我們要流傳給新世紀下一代的禮物又在哪裡？

許諾是奢侈的，也是虛妄的，我們不需要太多許諾，更不需要犬儒式地批判，我們需要的是實踐。去寫好作品，去翻譯名著，去支持台灣文學教育健全發展，去把台灣文學史寫出來，去展現作家的關懷與良知……。展望廿一世紀台灣文學的發展，台灣文學界需要的是更多的熱情的實踐者，而不是擘畫藍圖的說夢者。充分的本土化文學，就會具有全球化時代的獨特價值，這就是本土化中的全球化，這不待外求對岸或西方的肯定或收編，卻繫乎我們究竟要為這塊土地上的同胞開創怎樣一個台灣文學的下一輪百年盛世。